

王振鵠館長與漢學研究中心的創建發展

Professor Chen-ku Wang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耿立群 (Keng Li-chun) *

一、前言

王振鵠教授為臺灣圖書館界的巨擘，無論在圖書館行政、教學和研究著述方面，都有傑出傲人的成就。他於今（2019）年6月9日，在臺北市自宅睡夢中安詳辭世，享年95歲。蔡英文總統特明令褒揚，在6月22日聖家堂舉行的殯葬彌撒和公祭時，由教育部潘文忠部長代表頒發。褒揚令中有云：



王振鵠館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名譽教授王振鵠，……於掌理現國家圖書館期間，完備新館工程遷建，推展全國自動化事宜；創設漢學研究中心，收集流失珍本古籍，復極力實施國際標準書號，促進館際合作交流；協成出版品呈繳制度，建置書目資訊系統，碩學興革，體大思精；明見萬里，厥基丕奠，允為臺灣圖書館界領航者，……¹

由此可見，王教授於1977-1989年擔任國立中央圖書館（現易名為國家圖書館）館長時，任內最重大的貢獻可謂為籌建中山南路新館、推展圖書館自動化作業，以及創設漢學研究中心等。

本文擬就王振鵠館長的生平重要事蹟，以及他創建漢學研究中心的始末和其後的發展，做一簡介，謹此悼念王館長，並回顧漢學中心的沿革。

二、生平重要事蹟

王振鵠先生祖籍河北省濮陽縣（今河南省濮陽市），於1924年4月6日出生於天津。從小在嚴格的家教中成長，初中就讀天主教會學校（工商學院附屬中學），在外籍神父的管理下，生活非常規律。高中時期，時值對日抗戰，先生加入名為「抗日殺奸團」的學生組織，從事一些宣傳工作。1943年初於天津被日本憲兵隊拘捕，自此繫獄將近三年。這段牢獄折磨，讓他的身體

* 作者為前國家圖書館國際合作組主任、漢學研究中心副主任。

1 見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108年6月21日褒揚令—王振鵠」，網址：<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80>。

變得虛弱，且對其個性有很大的影響，他自述：養成他內斂、與人無爭和冷靜沉著的性格，也鍛鍊出多層面和深入思考的習慣，較能設身處地的為他人設想。²

1945 年抗戰勝利後，先生進入北京的中國大學中國文學系就讀，至 1948 年暑期畢業。1949 年 10 月來臺灣，進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身）圖書館工作，自此與圖書館結緣。1955 年升任該校圖書館主任，時年才 31 歲。1958-59 年，先生經甄試，獲得赴美進修考察的機會，這是美援計畫中的一項人員教育計畫，他由此申請到美國田納西州的范德比大學畢保德師範學院（George Peabody College, Vanderbilt University）圖書館學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除了獲得學位外，先生利用此行，訪問參觀了美國各知名大學和公共圖書館，合計近百所，對圖書館管理的理念和實務，有很大的啟發和印證。回國次年（1960），先生開始在師範學院社會教育系圖書館組擔任講師，迄 1966 年升任教授。當年師範學院改制為師範大學，先生既已通過教授升等，遂順理成章兼任師大圖書館館長之職；其後又於 1972 年開始接任社會教育系主任。在此期間，王館長曾主編《圖書館學》一書，為概論性的大學用書，出版後被各校廣為採用。又於 1975 年創編《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半年刊，為臺灣圖書館學期刊中較早發行者。³

1977-1989 年先生借調至國立中央圖書館擔任館長。在 12 年多的任期中，他規劃並完成了館舍遷建大業，歷經八年的籌劃興建，中山南路宏偉典雅的新館，於 1986 年 9 月落成啟用，較南海路舊館擴增數倍，館務亦大幅開展。另外，他於 1980 年成立「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規劃委員會」，推動圖書館作業自動化計畫，第一階段分成中國編目規則、中文機讀編目格式及中文標

題總目等三個工作小組，開啟了臺灣圖書館界以電腦處理書刊資料的新紀元。1981 年創立「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容後詳述），又倡組「中華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圖書館館際合作組織」，及創編《中華民國圖書館年鑑》。1989 年成立國際標準書號中心，負責我國出版圖書之 ISBN 登記和預行編目（CIP）作業。種種傑出的表現，讓王館長獲得許多獎項的肯定，尤其集中在中央圖書館新館啟用後的二、三年，包括 1983 年總統頒贈行政院所屬機關保舉最優人員榮譽紀念章；1986 年中國圖書館學會贈圖書館特殊貢獻獎；1987 年羅馬教廷頒聖思維爵士勳獎，美國華人圖書館員協會頒發傑出服務獎，行政院頒發三等功績獎章；1988 年美國俄亥俄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等。⁴

1989 年王館長在中央圖書館屆齡退休，歸建回臺灣師範大學繼續教職。1990 年先生組團赴大陸訪問，開啟兩岸圖書館界正式交流。事實上，王館長自 1960 年起連續在臺師大社會教育系和圖書資訊研究所教學了 44 年，同時也曾任臺灣大學、政治大學、輔仁大學、中國文化大學等校兼課，即使在他接任公職，甚至退休後都不曾中斷。可謂在臺灣圖書資訊學界桃李滿天下。先生甚受學生和同道敬重，因此在他 80 歲和 90 歲時，圖書館學會等單位分別舉辦了「王振鵠教授圖書館學術、教育與志業：見證臺灣圖書館事業發展研討會」和「臺灣圖書館事業發展——王振鵠教授學術思想研討會」。⁵

在學術著作方面，王教授的研究成果頗豐，包含專著 40 種、單篇論文約 400 篇，其中《圖書館學論叢》和《臺灣圖書館事業文集》兩部論文集可謂其研究精華之彙粹。⁶

2 王振鵠，《書緣：圖書館生涯五十年（增訂版）》（臺北：書緣編印部，2014），頁 8-10、15、22-23。

3 同上註，頁 24、27-28、32、40-41、48-49、64-66。

4 參見顧力仁，《誠與恆的體現：王振鵠教授與臺灣圖書館》（新北市：華藝數位公司，2019），〈王振鵠教授紀要〉，頁 iii-iv。

5 同上註，頁 iv-v；王振鵠，《書緣：圖書館生涯五十年（增訂版）》，頁 62。

6 「王振鵠著作目錄」一見於王振鵠，《書緣：圖書館生涯五十年（增訂版）》附錄一，頁 254-293；另見於顧力仁，《誠與恆的體現：王振鵠教授與臺灣圖書館》，〈附錄二、王振鵠教授著作及傳記分類目錄〉，頁 325-372。《圖書館學論叢》由臺灣學生書局於 1984 年出版；《臺灣圖書館事業文集》由國家圖書館於 2014 年出版。

三、創立漢學研究中心

對漢學界而言，國立中央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於1981年創立「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應是王振鵠館長任內最重大的貢獻。

打造臺灣成為世界漢學重鎮，是自政府遷臺以來，人文學界長久的期盼與目標。當時由於國家大批重要文物古籍移存臺灣，且很多優秀學者隨政府避禍來臺，而當時中國共產黨採鎖國政策，臺灣遂成為國際研究漢學的窗口；然而國際漢學界僅視臺灣為研究資料的皮藏地，巴黎、東京方被認為是國際漢學研究重鎮，因此臺灣和海外華人學者，一直力圖提升國內漢學研究質量與國際能見度，且積極催生具整合功能的學術行政機構。⁷如蔣復璁、屈萬里、嚴耕望、沈剛伯等學者都倡議將臺灣發展為漢學研究重鎮，當時行政院孫運璿院長非常重視這些建議，於1979年6月巡視教育部時，指示教育部應將漢學研究及加強對國內外學者的學術性服務，列為施政重點之一。⁸

當時教育部部長朱匯森希望本館能負責籌劃，王館長遂於1980年1月17日邀請了幾位專家學者，包括回臺參加國建會的一些海外教授共同討論，出席者包括潘重規、羅錦堂、黃得時、張朋園、宋晞、李雲漢、陳三井、昌彼得等教授，大家一致建議應積極進行，並提出一些具體建議。⁹於是本館擬訂了「籌設漢學研究資料暨服務中心計畫」，在1980年4月22日由教育部轉陳行政院核定籌劃。

依據行政院修正之核定內容，中心名稱訂為「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工作要項有五：1. 研訂國內外合作蒐集漢學資料之計畫，2. 調查各國漢學資料館藏與

報導世界漢學研究之消息，3. 建立國內學人專長檔及編製漢學目錄及索引，4. 提供漢學資料之複印、代購及交換服務，5. 協助國外來華研究漢學人士之研究工作。組織方面，中心設有指導委員會，由教育部部長聘委員13人至17人，任期二年，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至少每半年開會一次，研訂重要政策方針。中心本身置主任一人，由教育部部長聘任，副主任一人，資料組、聯絡組各置組長一人，幹事三至五人，均由本館人員兼任。另外，中心得於國外設置聯絡員若干人，並得聘諮詢顧問若干人。經費除第一年由教育部編列報院撥發外，逐年由本中心主任編製預算，經指導委員會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列入年度預算。¹⁰

由此籌設計畫，可見本中心自始即以「資料」和「服務」為重點，王館長曾說明為何定名「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係考慮到圖書館的職掌和能力，恐研究非本館人力和資源上所能勝任，所以不宜稱之為「漢學研究中心」；這是一種非常務實的做法，也可反映王館長謙沖的個性。不過，至1987年，教育部為加強本中心之學術研究功能，令中心更名為「漢學研究中心」。本中心既以對人文學界的資料服務為宗旨，則指導委員會的設置是非常重要的，它讓中心與學界有緊密的連結，由教育部敦聘學有專精、望重士林的學者擔任本中心的指導委員，研訂重要政策方針，俾使中心較易獲得學術研究的規範與脈動，並確保其服務能切合學界的需求。

此一籌設計畫經行政院核定，暫以任務編組的方式建立組織，責成本館兼辦。第一年准以約聘、約雇方式增加六人辦理一切業務，另核撥開辦費新臺幣1,400萬元。以這樣的人力開辦一個中心，自然是很吃緊的，也

7 參見黃寬重，〈從服務出發，營造漢學研究優質環境——漢學研究中心三十年有成〉，《漢·全世界做朋友：漢學研究中心三十周年特刊》（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11），頁7。又如1976年《幼獅學誌》13卷1期曾製作「漢學研究中心專輯」，有高明、羅錦堂、周法高、劉兆祐等學者撰文，可見當時學界對此議題之重視。

8 王振鵠，《書緣：圖書館生涯五十年（增訂版）》有專章〈八、致力成為漢學研究重鎮——創立漢學研究中心〉，頁164-175。以下引用自此書，不一一作註。

9 〈籌設漢學資訊服務中心，本館邀國內外學者座談〉，《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3:1（1980.4）：111-112。順帶一提，《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亦為王館長於1978年4月創刊的。

10 〈行政院核定本館籌設漢學資料及服務中心〉，《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3:2（1980.7）：123。此則訊息列於封面之「特訊」頭條，可見漢學中心之籌設受到館方極大的重視。

與本館原先的要求有所差距；不過王館長說，一千多萬元的購書經費，在當時是相當大的一筆預算，等於當年本館本身購書預算的兩倍半。

其實以當時時空背景而言，本館新館遷建雖已核定建築用地，然而正在多方設法解決地上物的拆遷和補償，而圖書館自動化作業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規劃和開展之中，突然間又要承擔推動漢學研究這重擔，責任非常艱鉅。¹¹ 王館長自述係基於兩點考慮而毅然承接此重任，一是漢學中心以蒐藏漢學研究資料為重點，成立後能獲政府長期提供專項經費，並聘有學科專長人員執事，將有助於本館的館藏發展；二是考慮新館落成後要如何導引學術界人士利用其設施和館藏？希望藉由漢學中心讓本館加強與學術界的聯繫，展現其學術服務功能。

1981年6月教育部遴聘王館長兼任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主任，中心辦公室設於本館之內，館內調派蘇精先生任聯絡組組長，劉顯叔先生任資料組組長。同年9月30日教育部召開中心指導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由朱匯森部長主持。時任第一屆指導委員者為王壽南（政大歷史系主任）、王振鵠、呂實強（中研院近史所所長）、李國祁（臺師大文學院院長）、李雲漢（黨史會副主委）、林衡道（臺灣省文獻會主委）、呂彼得（故宮博物院文獻處處長）、高去尋（中央研究院院士）、陳興夏（臺大圖書館館長）、黃得時（臺大中文系教授）、潘重規（文化大學教授）、鮑幼玉、嚴文郁（輔大文學院教授）等教授，計13位。其中王振鵠和鮑幼玉是以本館館長和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而為當然委員。會中推選王館長為主任委員。王館長提出了未來一年具體工作計畫，包括本中心圖書資料採訪計畫、建立世界漢學機構和學人專長檔計畫，及編印漢學通訊計畫等。委員亦提出不少建議，包括漢學資料蒐集應以文史哲學科為主，大陸出版品有研究價值者可考慮蒐集；加強目錄服務如編印各類索引目錄等，每年舉行一次小型國際會議；通訊訂名為《漢學研究通訊》，以季刊發行，以報導漢學

研究、教學、活動、資料四項消息為宗旨。¹²

由指導委員名單可見，含括各重要學術機構之文史學者，且多為具行政職務者。第一次指導委員會會議由教育部長親自主持，顯見當時教育部對漢學中心和指導委員的重視，而委員們也確實提供了具前瞻性和中肯的意見。至今漢學中心的指導委員已是第19屆，30餘年來維持類似的運作機制，委員們不僅學養豐富，學術地位崇高，開會時對漢學中心的業務給予許多寶貴的建言，且常為中心的定位和前景發聲，¹³或代為向上級或外界爭取資源，對中心的穩健發展，具有莫大的貢獻。

四、漢學中心初期業務發展

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最初的業務以編印書刊和蒐購圖籍資料為主。前者由聯絡組負責，後者由資料組負責。其後陸續展開舉辦學術會議和獎助外籍學人等計畫。

（一）書刊編印

漢學中心編印書刊的成績是很亮眼的，多元而質精，且出版速度很快。自1981年9月開過指導委員會，次年1月《漢學研究通訊》（季刊）就創刊了；同年10月出版《海外漢學資源調查錄》。1983年4月創刊《臺灣地區漢學論著選目》（年刊），6月創刊《漢學研究》（半年刊）；同時開始編印本中心叢刊，叢刊目錄類第1種《光復以來臺灣地區出版人類學論著目錄》於6月出版，叢刊論著類第1種《第二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於7月印行。1984年2月又創刊《外文期刊漢學論評彙目》（季刊），7月出版《近代東北區域研究資料目錄》，是為叢刊目錄類第2種。可見漢學中心在開辦三年內，就創刊了四種期刊，且規劃編印二種叢刊。

《漢學研究通訊》為國內人文學界最早發行的通訊報導型期刊，報導的內容包括海內外漢學研究之現況、

11 顧力仁，《典範的時代和理想的人格——王振鵠館長與國立中央圖書館》（新北市：華藝學術出版社，2014），頁65。

12 〈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召開指導委員會會議〉，《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4:3（1981.10）：189-190。

13 例如2010年行政院進行組織改造，漢學研究中心面臨是否打散整併至國家圖書館的危機，《國文天地》26卷5期特製作「漢學研究中心三十週年紀念」專輯，撰文者包括許倬雲、黃寬重、王國良、劉兆祐、王璦玲、陳珏和王汎森等教授，皆大聲疾呼強調漢學研究中心的重要性；其中多位是漢學中心指導委員，另亦有與中心業務互動較多的學者。

國內各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研究和教學、國際漢學機構介紹、學人專訪，及研究資料介紹等。自創刊起即在各大學和研究機構文史哲相關系所設置通訊員，定期提供訊息稿件。猶記得筆者在臺大歷史所就讀時，曾目睹漢學中心聯絡組蘇精組長拜訪當時助教吳密察先生，可見漢學中心能成為學術連繫的平台，是靠著早期和其後同仁們一點一滴的努力，積極拓展與學界的關係。該刊發行很廣，頗受國內外漢學界重視，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教授曾以個人經歷為例，認為「《漢學研究通訊》及後來的電子報，恐怕是全世界最成功的漢學連絡刊物。我甚至覺得現今臺灣許多高水準的人文學報，在世界上的流通度及閱讀率都遠不及《漢學研究通訊》。」¹⁴

《漢學研究》為一文史哲綜合性國際漢學學報，兼收論文和書評。原為半年刊，因投稿量大，自 2008 年第 26 卷起改為季刊發行。王振鵠館長自述，當年在指導委員會議中，提出要出版《漢學研究》的計畫時，有的指導委員抱著懷疑的態度，認為一份學術性刊物在徵稿、審稿和編印上都非易事，漢學中心能夠編出一流的學術性刊物嗎？然經周詳的計畫，嚴謹的態度，尤其剛開始時蘇精組長積極向學界邀約佳作，奠定初基。其後在歷任主編和編輯委員會堅持高品質的理念下，該刊曾連獲國科會「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良期刊」獎勵，亦長期為「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 Core)。王館長在多年之後，每次在不同場合碰到筆者，總是說本中心寄贈給他的《漢學研究》和《漢學研究通訊》，他都會翻閱，也總是誇讚編印得不錯，可見先生對漢學中心的關切和欣慰之情。

《臺灣地區漢學論著選目》，每年 4 月出刊，收錄前一年內臺灣出版的漢學專書、期刊論文、論文集，及學位論文，精選分類編輯；後附作者索引和收錄期刊一覽表。每五年出版彙編本。《外文期刊漢學論評彙目》(季刊)，收錄外文學術期刊中有關漢學研究之論文和書評，依刊名彙錄其書目資料。這二種刊物係為便學者迅速掌握國內外之研究成果而發行，皆賴漢學中心同仁定

期蒐集爬梳資料，加以編輯整理，是很紮實的資料服務工作；對學者之研究助益頗多，本中心早期提供的複印、代購服務，很多學者亦是由此二刊物中之篇目和專書取材。可惜其後有於人力不足，二刊相繼於 1992 年和 2000 年停刊。

叢刊目錄類係由本中心委託漢學各學門專家，就各研究專題編製論著目錄或索引，供學界參考利用。如《光復以來臺灣地區出版人類學論著目錄》是本中心與中國民族學會合作，由當時的中研院民族所黃應貴副研究員主編；《近代東北區域研究資料目錄》係與中研院近史所合作，由趙中孚研究員主編。其後陸續出版者有：《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王德毅主編)、《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鄭阿財、朱鳳玉主編)、《中韓關係中文論著目錄》(黃寬重主編)、《中國家庭之研究論著目錄》(李亦園、莊英章主編)、《唐代文學西文論著選目》(倪豪士(William H. Niehauser, Jr.)主編)、《二十世紀中國作家筆名錄》增訂版(朱寶樑編)、《經學研究論著目錄》(林慶彰主編)……等等，共計約 20 種。這些目錄索引，亦形成本中心出版之特色，一來它的學科涵蓋面很廣，二來它是與國內外學者合作，既具專業性，也藉此加強了與學界的交流，三是部分目錄隔若干年後有續編付梓，如經學、敦煌學、兩漢諸子等，持續掌握新的研究成果；這些目錄後來也陸續建置成資料庫，可在漢學中心網站「專題資料庫」中檢索。

叢刊論著類大抵上是編印研討會論文集。除第一種《第二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係收錄 1982 年中研院史語所和經濟所合辦的研討會論文外，其餘各冊皆係將漢學中心本身召開的研討會，會後編印論文集，納入此叢刊。包括《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中國人的價值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等，至今已出版十餘種。¹⁵

至於漢學中心所出版的第一本專書《海外漢學資源調查錄》，是為汪雁秋主任結合本館和本中心同仁合作

14 王汎森，〈漢學研究中心的貢獻及面臨的危機〉，《國文天地》26：5（2010.10）：29-30。

15 有關漢學中心各出版品之介紹，可參見王玉琴，〈編印出版豐富優質的漢學研究書刊〉，《漢·全世界做朋友：漢學研究中心三十周年特刊》，頁 30-39。

完成的，內容根據問卷調查統計資料，收錄 35 個國家地區計 288 個漢學收藏單位之簡介、館藏和出版品。頗具參考價值，亦可見本館素與海外的漢學機構有合作連繫，這是漢學中心設於本館的淵源與方便之處。

（二）蒐購圖籍資料與閱覽服務

人文研究主要靠圖書文獻資料，漢學中心設於本館，如何建立館藏以服務漢學界，又能與本館相輔相成呢？在漢學研究領域中，古籍文獻為主要研究素材，本館所藏善本古籍雖很豐富，但仍有不少珍籍散佚海外，本中心在成立之初，即著手調查與蒐羅海外佚籍。自 1982-1989 年，漢學中心以臺灣地區所藏已稍具特色的古籍優先進行補缺，輯佚古籍的來源主要為日本，並兼及美、英等地，典藏單位包括：日本的國會圖書館、內閣文庫、尊經閣文庫、宮內廳書陵部；美國的哈佛燕京圖書館、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英國的劍橋大學圖書館、倫敦大學圖書館、里茲大學圖書館；烏拉圭國立圖書館等。以上所蒐集的海外輯佚古籍，計經部 210 種，史部 381 種，子部 34 種，集部 335 種，凡 960 種，皆以照相翻製為紙本的方式裝訂收藏；其中以「明清方志」和「明人文集」類最多，使臺灣原有的古籍收藏更加充實完備。並於 1990 年編印《漢學研究中心景照海外佚存古籍書目初編》一書，供學界查檢。1989 年之後，受限於經費，本中心的輯佚古籍工作遂停擺。¹⁶

除了上述海外佚籍外，漢學中心的收藏重點還包括大陸漢學書刊和海外「中國研究」博士論文。在當時戒嚴時代，採購大陸出版品需專案申請，經警備總部核准方可蒐藏；漢學中心是當年少數獲准蒐購大陸出版品的典藏機構，因此收藏較為豐富齊全。本中心蒐集大陸地區的漢學研究專著和學報期刊，以文學、史學、哲學、藝術、考古及社會科學等領域為主；迄今收藏大陸圖書約 18 萬餘冊及學報、期刊約 1,600 種。海外「中國研

究」博士論文蒐藏有美國、加拿大、荷蘭、英國等大學有關中國研究的博士論文，約 11,000 餘種；建置「典藏國際漢學博士論文摘要資料庫」，方便線上檢索。

一般外文的漢學資料，漢學中心亦致力蒐購。由漢學中心發布的年度工作要項中，可見訂購漢學西文圖書和期刊，日文圖書和期刊，並自國內外藏書單位複印館藏所缺期刊，以及自歐美各國購入中文微捲期刊、報紙等，數量頗多。¹⁷ 由此可見王振鵠館長利用漢學中心之設立，以充實本館之館藏發展，成果是符合預期的。

1984 年 9 月設置了漢學研究中心資料室，於南海路植物園內青年大樓二樓，提供研究人員閱覽利用。1986 年 9 月隨中山南路本館新館啟用，資料室遷至新館六樓迄今。¹⁸

（三）舉辦研討會與獎助外籍學人

第一次指導委員會議時，曾有委員建議漢學中心每年舉行一次小型國際會議，邀請各國學者參加，以提高本中心地位。於是漢學中心在開辦後的第四年，1984 年 12 月 16-18 日召開了第一次國際會議「中國思想史國際研討會」，這是與國立清華大學合辦，在新竹市該校舉行。次年 4 月 1-3 日又在臺師大綜合大樓舉辦了「方志學國際研討會」。本中心舉辦的第三場國際會議是為「敦煌學國際研討會」，由中央圖書館和中國文化大學敦煌學會協辦，於 1986 年 8 月 1-3 日在新落成的本館新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此為中山南路新館國際會議廳的首次啟用，別具意義。事實上要到該年 9 月 28 日新館才正式開放使用，王振鵠館長以漢學中心主辦的「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讓美輪美奐、具先進會議設備的國際會議廳提前亮相，應是一來對漢學中心辦研討會的品質有信心，二來藉此向學界宣示本館新館時代的學術服務層面，我想先生或也帶有幾分自豪吧！

此後漢學中心每一至二年舉辦一次國際研討會，

16 張璉，〈海外佚存古籍的源流與學術價值——兼談漢學研究中心所藏景照海外佚存古籍〉，《漢學研究通訊》18：1（1999.2）：14、16。

17 漢學中心設立之頭二年，均在《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刊布漢學中心一年來工作要項，見《館訊》5：1、2（1982.7）：217；6：2（1983.7）：275。其他工作事項尚包括：製作國內外漢學學人專長檔：分函國內外各漢學研究機構提供資料，並參照各種工具書寄發調查表；編印中華民國漢學研究機構錄；資料代購及複印服務等。

18 參陳友民，〈漢學資料蒐藏與閱覽服務〉，《漢·全世界做朋友：漢學研究中心三十周年特刊》，頁 25-27。

大抵都在本館國際會議廳召開，包括：明代戲曲小說國際研討會（1987年）、漢學研究資源國際研討會（1988年）、民間文學國際研討會（1989年）、中國人的價值觀國際研討會（1991年）……等等，至今已主辦約30場。研討會主題涵蓋範圍相當廣，本中心常邀不同的學術機構共同主辦，以確保會議的專業性，且籌劃研討會周詳嚴謹，邀請與會之學者均為國際漢學界和臺灣優秀的專家，會後也大多將會議成果再經修訂、審查而輯編論文集，早期利用《漢學研究》專號出版，後來多列入漢學中心叢刊論著類。透過這些研討會的舉辦，加強了國內外學者的學術交流和合作，提升了國內的研究水準和風氣，同時也增進了研究資料的互通利用。

為促進國際漢學的研究與交流，漢學中心在創立之初，即在五大工作要項中明列「協助國外來華研究漢學人士之研究工作」，經數年的規劃細節和爭取預算，本中心自1989年開始實施「協助漢學研究人士來華研究計畫」（現更名為「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提供機票和每月研究補助費，獎助國外自教授以至博士候選人之漢學研究者，來臺灣進行三個月至一年的研究。

本中心提供獎助學者在臺研究和生活中的各種協助，舉辦學術討論會讓他們發表研究成果，與國內學者相切磋。每年辦理一次文化參觀活動，春節、端午、中秋亦安排餐會或茶會，讓他們領略臺灣風光和中華民俗文化；凡此皆令學人們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此獎助計畫頗受國際漢學界重視，申請者十分踴躍，經館外專家嚴謹的審核，每年錄取者約十數人。實施迄今已達30年，獎助過的學者有1,700餘人，來自歐美亞太各洲43個國家，對臺灣的國際學術交流和合作，具有莫大的績效。由於成效良好，2010年外交部開辦「臺灣獎助金」，也委由漢學研究中心辦理行政事務與接待事宜。

五、結語

王振鵠教授畢業於北京中國大學中文系，美國范德

比大學畢保德師範學院圖書館學研究所碩士，一生致力於臺灣圖書館事業。長期從事圖書館行政工作，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以及臺師大社會教育系主任等，任內皆有諸多建樹。先生亦終身擔任教職長達40餘年，除臺師大社教系和圖書資訊研究所外，亦曾在臺大、政大、輔大、文化大學等校兼課，為圖書館教育奉獻心力，作育英才。

先生領導國家圖書館時，於1981年創立了漢學研究中心。本中心迄今已運作近40年，藉圖書文獻、出版、獎助和各種學術活動，為國內外漢學界服務，被視為一重要的學術平台，甚至有學者認為它可與美國哈佛燕京學社、普林斯頓高深研究所，荷蘭國際亞洲研究院、德國華裔學志社相比擬而毫不遜色。¹⁹ 本文將王振鵠館長承教育部令籌設漢學研究中心的過程，和初期本中心的業務，做了簡要的敘述，發現王館長自始就衡量國家圖書館的特性和能力，而務實地將漢學中心定位於「資料及服務」中心，而本中心各項重要業務，更是在一開始就規劃妥善，且很迅速地一一推展開來，所以漢學中心甫成立即有亮眼的表現，受到學界的關注。如王汎森院士曾表示：「漢學研究中心創立之後，就成為臺灣學者學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印象中的漢學研究中心就是一個非常『慎始』的機構。它最初的一批出版品，便以印刷精美、風格嚴謹、質樸，讓人留下深刻印象。而這個風格也一直延續至今。」²⁰ 這不得不歸功於王館長和早期漢學中心蘇精、劉顯叔兩位組長的高瞻遠矚和華路藍縷，為本中心奠下良好而堅實的基礎。

猶記得2010年漢學研究中心慶祝三十周年時，拍攝了一支影片。當時請創始人王館長講述本中心的緣起、任務和重要業務，並以此貫穿全片。先生時年87高齡，但口齒清晰，條理分明，無須講稿即侃侃而談，記憶力極佳，令我們後生晚輩感佩不已。由此可見王館長對漢學研究中心的重視與感情。值此先生榮歸天家之際，謹以本文表達我們無盡的追思悼念。

19 陳珏，〈臺灣和海外漢學發展的「競」與「合」——漢學研究中心與歐美、東亞其它漢學機構的比較〉，《國文天地》26：5（2010.10）：23。

20 王汎森，〈漢學研究中心的貢獻及面臨的危機〉，頁29。